

Title	粟特人與前涼王國
Author(s)	馮, 培紅
Citation	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 2015, 30, p. 159-171
Version Type	VoR
URL	https://hdl.handle.net/11094/70117
rights	
Note	

Osaka University Knowledge Archive : OUKA

<https://ir.library.osaka-u.ac.jp/>

Osaka University

粟特人與前涼王國

馮 培 紅

1. 前言

敦煌粟特文信劄的年代被攷訂為 312-313 年⁽¹⁾。對於這一年代，學界更多地是把它當作西晉末來看待，但此時晉都洛陽失守，懷帝被俘，自顧不暇；而涼州刺史張軌統治河西已踰十年，尤其在經歷 308 年張越·曹祛之亂後，具有了明顯的獨立性格，史稱“前涼”。因此，與其把粟特文信劄的時代視作西晉末，不如說在前涼初更為恰當⁽²⁾。

439 年北魏攻克北涼都城姑臧，『北史』卷 97「西域傳」“粟特國”條記載“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及魏克姑臧，悉見虜”。從“先”字觀之，粟特商人在北涼滅國前就已來到河西開展貿易，這為上述前涼初粟特文信劄所證實。

上揭粟特文信劄與傳世史籍記錄的時代分別為前涼初與北涼末，也就是說，在整個十六國五涼時期，有許多粟特人離開中亞本土，來到河西走廊從事商業貿易。這些生活在五涼王國的粟特人究竟是如何活動的？除貿易之外在政治上扮演了什麼角色？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學界對此探討甚少⁽³⁾。因篇幅所限，本文僅對前涼王國中的粟特人進行鉤沈攷索，至於其他諸涼則容另文討論。

(1) 關於粟特文信劄斷代的學術史，畢 2004 (pp. 73-77) 有詳盡的梳理。其中持 312-313 年說的成果有 Henning 1948, pp. 601-615; Grenet & Sims-Williams 1987, pp. 101-122; 陳 2002a, pp. 66-71.

(2) 也有學者提到粟特文信劄寫於前涼張軌時，如陳 1987 (p. 92) 說“寄書的年代，相當於前涼張軌之世”，畢 2004 (p. 80) 說“古信劄即寫於張軌統治涼州之時”，但他們都未對粟特人與前涼的關係作進一步研究。

(3) 後藤 1967 (pp. 34-35) 專列“五涼王国と西域胡人”一節，但僅舉出康妙·康盛·康寧·安據四人；陸 1992 (p. 49) 對五涼時期的西域胡也祇是畧有觸及。

吉田豊・荒川正晴兩教授是著名的粟特研究專家，利用粟特文與漢文史料探討古代東西交通史上起到重要作用的粟特人，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筆者有幸於 2006-2007 年在大阪大學跟隨荒川教授從事博士後研究，並在森安孝夫教授主持的每週六“出土文書ゼミ”上與吉田教授對面而坐，得以聆聽諸賢討論與教誨。今值吉田・荒川兩教授還曆紀念，不揣譎陋，就其精研之粟特領域撰此小文，以為祝賀。

2. 張軌時粟特人在河西的商業貿易

斯坦因 (A. Stein) 在敦煌西北長城烽燧 T.XII.a 遺址發現的粟特文信劄，展現了粟特人在以前涼國都姑臧為中心的河西走廊乃至更廣地域的商貿網絡⁽⁴⁾。如果說第 1·3 號信劄祇是居住在敦煌的米薇 (Miwnay) 給母親與丈夫的私信，尚少涉及商業話題⁽⁵⁾，那麼第 2·5 號信劄則是居住在姑臧的代理商向主人 (第 5 號言明是隊商首領) 詳細報告了永嘉之亂前後粟特人·印度人在中國的貿易情況。

第 2 號信劄的發信人那你槃陀 (Nanai-vandak) 對撒馬爾罕的主人說：“自從我送索勒 (Saghrak) 和芬阿喝 (Farn-āghat) 到‘內地’已經八年了”，表明早在張軌統治涼州 (301-314) 初年，這些粟特人就已來華從事貿易。該信提到“當商隊離開姑臧”⁽⁶⁾，尤其是第 5 號信劄的發信人發黎呼到 (Firi-khwatāw) 說“我如今呆在姑臧這兒”“因為我還在姑臧效勞”，以及未署“寄自您的僕人發黎呼到。此信於第 3 個月的第 30 日寫於姑臧”⁽⁷⁾，可見涼州姑臧成了粟特商人從事絲綢之路中轉貿易的大本營。

『十六國春秋·前涼錄』云：“張軌時，西胡致金胡餅，皆拂菻作，奇狀，並人高，二枚”⁽⁸⁾。參照後世高昌國王麴文泰將拂菻狗進貢給唐高祖，而唐人又將

(4) 參 de la Vaissière 2002, pp. 48-76.

(5) Whitfield & Sims-Williams 2004, pp. 248-249; 辛姆斯·威廉姆斯 2005, pp. 72-87.

(6) Sims-Williams 2001, p. 271. 漢譯文參畢 2004, p. 83.

(7) Grenet & Sims-Williams & de la Vaissière 1998, p. 93. 漢譯文參畢 2004, pp. 89-93.

(8) 『太平御覽』卷 758 「器物部三·餅」, p. 3365.

之稱作康國獮子⁽⁹⁾，可知在西起拂菻·東至中國之間從事中轉貿易的“西胡”，應為以康國為宗主國的粟特商胡。羅丰對文獻記載與攷古出土的金·銀胡餅作過詳細攷證，認為“‘西胡’大約是指中亞粟特人，作為禮品將金胡餅獻給張軌，以求安全通過這一地區以進行貿易”⁽¹⁰⁾。

3. 敦煌粟特人曹祛與張軌的政治較量

308年，張軌患染風疾，口不能言，以次子茂攝理州事。這時發生了一場規模甚大的叛亂，主要是敦煌張氏與曹氏·武威賈氏·西平麴氏與田氏等當地豪族聯合起來企圖取代張軌，以實現河西地區的本地化統治。王隱『晉書』曰：“張軌為涼州刺史，敦煌曹祛上言軌老病，更請刺史”⁽¹¹⁾。王隱生活在兩晉之際，“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¹²⁾，所言曹祛為敦煌人當無疑義。『唐故隋酒城府鷹揚曹君及琅耶郡君安氏墓誌並序』云：“君諱諒，字叔子，濟陰定陶人，晉西平太守曹祛之後也”⁽¹³⁾。從曹·安二氏聯姻判斷，志主夫婦當是入華粟特人之後裔。榮新江亦持此論，但他說“由這方墓誌我們可以知道有曹姓粟特人入華後的著籍地在西平”⁽¹⁴⁾，則欠準確。曹祛實為敦煌人，西平祇是他的任職之地。墓誌稱曹諒為濟陰定陶人，當是其祖·父仕於北齊而遷居該地之故。

房玄齡等『晉書』卷86「張軌傳」記載，“酒泉太守張鎮潛引秦州刺史賈龕以代軌，密使詣京師，請尚書侍郎曹祛為西平太守，圖為輔車之勢”。曹祛（又寫作“祛”）在西晉朝廷擔任尚書侍郎，能方便地向晉懷帝上奏，請求另派涼州刺史，取代病重的張軌。他自己也迅速迴到河隴，出任西平太守。在這場反張軌的鬥爭中，河西豪族集團的首腦人物是敦煌大族張鎮·張越兄弟⁽¹⁵⁾，與曹祛為同鄉，他們聯手對付張軌，是出於同一地域鄉黨集團的共同利益。面對河西

(9) 參叢 2012, pp. 46-48.

(10) 羅 2000, p. 312.

(11) 『太平御覽』卷366「人事部七·耳」, pp. 1683-1684.

(12) 『晉書』卷82「王隱傳」, p. 2142.

(13) 周 1992, pp. 135-136.

(14) 榮 2007, p. 168. 該文收入榮 2014 (p. 29) 時，加註了安·曹二氏的中亞本國地名。

(15) 參馮 2009, p. 105.

大族的聯合進逼，武威太守張璠遣子坦赴京為張軌請命，“張坦至自京師，帝優詔勞軌，依[司馬]模所表，命誅曹祛。軌大悅，赦州內殊死已下。命[張]寔率尹員·宋配步騎三萬討祛，別遣從事田迴·王豐率騎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驢，據長寧。祛遣麴晃距戰於黃阪。寔詭道出浩亶，戰於破羌。軌斬祛及牙門田囂”⁽¹⁶⁾。從晉廷下詔及張軌討伐的對象看，曹祛是這次反對張軌的主要人物之一，足見西晉末·前涼初河西粟特人的勢力確實不可小覷⁽¹⁷⁾。

此外，一些後世史料追述到張軌後期有粟特人進出河西走廊。『元和姓纂』卷6“史”姓條首望為“【建康史氏】今隸酒泉郡。史丹裔孫，後漢歸義侯苞之後。至晉永嘉亂，避地河西，因居建康”⁽¹⁸⁾；『南史』卷55「康絢傳」稱“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都護，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河西，因留不去，其後遂氏焉。晉時隴右亂，遷於藍田”。河西史·康二氏當為粟特人，他們在永嘉之亂時進出河西，與西晉末五胡入華的時代形勢及前涼初粟特人的活動背景是相契合的。

4. 姑臧祆教徒與張寔之死

314年張軌卒，子寔立，他在執政六年後為一幫左道之徒所殺：

初，寔寢室梁間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甚惡之。京兆人劉弘者，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燈懸鏡於山穴中為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

(16) 『晉書』卷86「張軌傳」，p. 2224。同傳（p. 2225）記載張璠統領“胡騎二萬”，吳1997（p. 303）說“固然不排除有其他胡人的可能，但是其中應該也有西域粟特胡人集團”。該傳（p. 2223）又載，“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模乃表停之”。據雷2004（pp. 41-48）攷證，這種割耳風俗源自於粟特。

(17) 此外，『晉書』卷107「石季龍載記下」（p. 2781）記載到前涼護軍曹權，不知與曹祛有何關係，是否亦為敦煌粟特人之後裔？

(18) 『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卷6，p. 822。本文列舉了前涼時五位史姓人物，另外明確標為建康郡人的有後涼史惠與北涼史豫·史灌父子（見『晉書』卷122「呂隆載記」，p. 3061；『周書』卷28「史寧傳」，p. 465）。甘肅省高臺縣羅城鄉地埂坡4號墓前室北壁繪有魏晉時期頭戴尖頂帽·鬚髮濃密的胡人形象（見徐2012，p. 36），為粟特人生活在建康郡（治今高臺縣駱駝城）提供了證據。又參園田2007，pp. 111-112。

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沙·牙門趙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靈，應王涼州”。沙·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為主。寔潛知其謀，收弘殺之。沙等不之知，以其夜害寔⁽¹⁹⁾。

劉弘在姑臧城南的天梯第五山中招聚了千餘名信徒，甚至連張寔身邊的閻沙·趙仰等十餘人都宗奉之，勢力頗大，圖謀殺害張寔，稱王涼州。從“然燈懸鏡於山穴中為光明”的宗教儀式看，不少學者認為是祆教，天梯第五山為其重要聖地⁽²⁰⁾。

尤可注意者，《資治通鑑》卷 91 東晉元帝太興三年（320）條提到一位誅滅劉弘的牙門將史初：

寔弟茂知其謀，請誅弘。寔令牙門將史初收之，未至，涉（《晉書》作“沙”）等懷刃而入，殺寔於外寢。弘見史初至，謂曰：“使君已死，殺我何為！”初怒，截其舌而囚之，輓於姑臧市，誅其黨與數百人。

作為張寔的親信，史初極可能也是一位祆教徒，對同教中人的密謀活動當有所瞭解；但他大概是河西建康的粟特人，與來自京兆的他族祆教徒不屬同一集團⁽²¹⁾，故將劉弘及其黨羽一舉誅滅。西晉滅亡前夕，愍帝密遣黃門郎史淑至涼州，任命張寔為大都督·涼州牧。寇克紅將史淑視作為漢人⁽²²⁾，可能是攷慮他來自長安，其實不無粟特之嫌疑，或許就屬於建康史氏，纔被派至河西本土。

關於張寔被害之事，《魏書》卷 99「私署涼州牧張寔傳」有一則謠讖：“蛇利砲，蛇利砲，公頭墜地而不覺”。蛇利或即舍利，為梵文 Śarīra 的漢文音譯，但榮新江揭出庫車文書 D.A.107《付糧曆》中有兩處“曹舍利”，言其很可能是譯自粟特文，為曹姓粟特人⁽²³⁾。果若如此，粟特人原本信仰祆教，似可佐證張寔

(19) 《晉書》卷 86「張軌附張寔傳」，p. 2230.

(20) 饒 1982, pp. 479-480；王 1985, p. 227；陳 2002b, p. 89.

(21) 劉弘來自京兆，從其姓氏·地域看，或許與匈奴劉氏有關。

(22) 寇 2008, p. 117.

(23) 榮 2005, p. 8. 並參 Trombert & Ikeda & Zhang 2000, p. 94, pl. 107.

確為祆教徒所害。

『唐故明威府隊正紇單府君墓誌銘』記其夫婦亡後，“合葬於州南十八里第五山之原胡村之界”⁽²⁴⁾，則知涼州姑臧城南天梯第五山有個胡村。陳國燦說：“劉弘客居的天梯第五山，唐時尚為胡村地界，是胡人聚居的村落，這恐怕在晉末已是如此”⁽²⁵⁾。聯繫後涼時京兆段業也隱居於天梯山，且與劉弘及閻·趙諸人為同鄉，後來出任建康太守並得到該郡粟特人史惠的支持，脫離後涼，建國北涼，也從側面印證了天梯第五山有一批來自京兆的祆教徒。他們大概和建康史氏一樣，因避永嘉之亂而西來河西。

張寔被害後，弟茂繼立。當時，前趙劉曜遣軍西攻前涼，“臨洮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長，以縣應曜，河西大震”⁽²⁶⁾。翟·石二氏為胡人無疑，前者出自丁零，後者可能是粟特人⁽²⁷⁾。

5. 張駿經營西域與粟特人

324年張茂卒，侄駿即位。在他執政時期，極力擴張勢力，向東收復河南地，向西經略西域，擊擒戊己校尉趙貞，征伐龜茲·鄯善·焉耆，設置沙州及高昌郡，以西胡校尉楊宣為沙州刺史。其經營西域的結果是，“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犍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所得玉璽題曰“執萬國，建無極”⁽²⁸⁾，充分顯示了前涼在西域的影響力。後涼時粟特人安據盜掘張駿墓，“得真珠籠·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馬腦鍾，水陸奇珍不可勝紀”⁽²⁹⁾。這些珍寶物品主要來自於西域⁽³⁰⁾，應當是以粟特為主的西域胡人販運到河西的，於此可以想見前涼張駿與西域諸國的經濟貿易獲得了空前發展。

(24) “五”“胡”二字，王 2001 (p. 29) 錄作“三”“明”。據該書圖版觀察，後一字當為“胡”。陳 2002b (p. 87) 亦錄作“第五山之原·胡村之界”。

(25) 陳 2002b, p. 90.

(26) 『晉書』卷 86 「張軌附張茂傳」，p. 2231.

(27) 姚 1962 (pp. 154-155, 381-384, 416-417) 列有三處石氏，出自鮮卑·粟特二族，尤以粟特居多。

(28) 『晉書』卷 86 「張軌附張駿傳」，pp. 2235-2237.

(29) 『晉書』卷 122 「呂纂載記」，p. 3067.

(30) Schafer 1963 (pp. 222-247) 列有玉·玻璃·真珠·珊瑚，在天青石條提到了瑪瑙。

斯坦因在樓蘭發掘了一些粟特文文書及簡牘，其中編號為 L.A.I.iii.1—沙木 886 的簡牘題寫：

- 1 建興十八年（330）三月十七日，粟特胡樓蘭
- 2 一萬石，錢二百⁽³¹⁾。

“特”字為墨跡所塗，“蘭”字下部筆劃殘損，但據殘存筆跡及上下文義尚可判斷出來⁽³²⁾。建興是前涼奉用的西晉愍帝之年號。胡平生指出，“建興十八年三月十七日入庫糧食一萬石·錢二百錢，糧食與錢得自樓蘭地方的‘粟特胡’。我們懷疑這些糧食·錢幣是前涼駐軍以租賦形式從‘粟特胡’那裏徵集來的”⁽³³⁾。顯然，此時有相當數量的粟特人居住在前涼統治下的樓蘭。吉田豐進一步揭出大谷文書粟特文 6117 號，認為與撰於 328 年的李柏文書一同出土於樓蘭⁽³⁴⁾。果若如此，就更可證實張駿時樓蘭地區有粟特聚落的存在。

6. 張天錫政權中粟特人的崛起

363 年張天錫弑侄玄靚，奪位自立，成為前涼末主。此時有不少粟特人仕於前涼，躋身宦途。

史載張天錫遣使東晉，“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並送盟文”⁽³⁵⁾。韓博的口才受到桓溫稱賞，自然是極佳的使節人選；而康妙之所以能夠一同出使，或如陳國燦所說：“為前涼充使於晉的康妙，應是久居涼州的康居胡人，或許由於他有過往來西北作商旅的經歷而遣”⁽³⁶⁾。康妙當為粟特人，因其具備胡語才能與商旅經驗，得以順利巧妙地通過前涼與東晉之間的其他國家。

『漸備經十住梵名並書敘第三』云：

(31) 侯 & 楊 1999, p. 61.

(32) Chavannes 1913 (p. 182, N°886.—L.A.i.iii.1) 未能識讀。

(33) 胡 1991, p. 42.

(34) Yoshida 1994, pp. 69-70. 並參百濟 & ズンダーマン & 吉田 1997, pp. 105-106.

(35) 『晉書』卷 86 「張軌附張天錫傳」, p. 2251.

(36) 陳 2002b, p. 77.

護公出『光讚』，計在『放光』前九年，不九年當八年，不知何以遂逸在涼州，……泰元元年歲在丙子（376）五月二十四日，此經達襄陽。釋慧常以酉年，因此經寄互市人康兒，輾轉至長安。長安安法華遣人送至互市，互市人送達襄陽⁽³⁷⁾。

酉年為 376 年稍前的癸酉年，即東晉寧康元年（373）。朱雷據之攷察了從前涼姑臧到前秦長安，再到東晉襄陽的交通路線，涼州互市人康兒與長安安法華均為粟特人，在溝通十六國與東晉之間的商業貿易及佛教傳播上扮演了仲介角色⁽³⁸⁾。由此我們聯想到，東晉成帝拜張駿為鎮西大將軍，“以詔書付賈陵，託為賈客。到長安，不敢進，以咸和八年（333）始達涼州”⁽³⁹⁾。朱氏認為“託為賈客”就是偽裝成互市人。

陝西省博物館藏有一件升平十三年（369）的金錯泥簡，所刻文字中有“舍人臣史融”⁽⁴⁰⁾。376 年前秦軍隊攻至河西，前涼“中衛將軍史景亦沒於陣”⁽⁴¹⁾。『三十國春秋·簡文帝』云：“太元元年（376），涼亡。涼天水太守史稷暴疾死”⁽⁴²⁾。這三位史氏在前涼未擔任內外官職，他們與前述史淑·史初一樣，極可能是前涼初移居到河西建康的史氏之後裔，反映了粟特史氏在前涼政治舞臺上的崛起。

7. 結語

通過鉤稽前涼時代的粟特資料，可以發現，在前涼王國中自始至終都有粟特人的活動蹤跡，而且在政治·經濟·宗教·軍事等方面都頗為活躍。

在西晉五胡入華的時代大背景下，中亞粟特人紛紛東來，許多定居在河西走廊，尤其是前涼國都姑臧成了粟特人從事中轉貿易的大本營。隨著經濟勢力的膨脹，以敦煌曹祛為代表的粟特人與同鄉大族張氏聯合起來，反對張軌，謀求

(37) 『出三藏記集』卷 9, pp. 332-333.

(38) 朱 2000, pp. 327-336.

(39) 『晉書』卷 86 「張軌附張駿傳」, pp. 2238-2239.

(40) 秦 1972, p. 36.

(41) 『晉書』卷 86 「張軌附張天錫傳」, p. 2252.

(42) 『三十國春秋輯本』, p. 11.

河西地區的本地化統治，其勢力讓人刮目相看。張寔死於一群祆教徒之手，他們在天梯第五山中聚眾千餘人，同樣說明了這一點。

從前涼前期的史淑·史初到末年的史融·史景·史稜，這支在永嘉之亂時遷居到河西建康的史氏粟特人，顯然已經崛起於前涼的政治舞臺上。後來形成建康史氏之郡望，自然是水到渠成之事。

前涼中期，張駿積極向西擴張，設立沙州及高昌郡，以管轄西域，樓蘭的粟特人聚落也成為前涼統治下的編戶百姓。前涼的疆域“西苞葱嶺”⁽⁴³⁾，與粟特本土之間的交通聯絡也較為方便。

前涼時期，粟特人入華不久，在他們身上保留了經商貿易·信仰祆教·充當使節等特點，較易辨識其身份。不過，前涼是漢人張軌家族建立的政權，長期遵用西晉建興年號，遙奉東晉為正朔，擎舉漢文化之旗幟。前涼初期與粟特人經常發生衝突，是地域利益與民族宗教之爭的反映，但越到後來越趨於融合，粟特人逐漸成為前涼王國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典籍史料

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令狐德棻『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

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

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

林寶『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北京，中華書局，1994。

李昉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

蕭方等（著），湯球（輯補）『三十國春秋輯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新1版。

⁽⁴³⁾ 『資治通鑑』卷100 東晉穆帝永和十二年（356）條，p. 3154。

參攷文獻

畢波

2004 「粟特文古信割漢譯與注釋」『文史』2, pp. 73-97.

Chavannes, É.

1913 *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 Imprimerie de l'Université.

陳國燦

2002a 「敦煌所出粟特文信割的書寫地點和時間問題」『敦煌學史事新證』蘭州, 甘肅教育出版社, pp.56-72.

2002b 「魏晉至隋唐河西胡人的聚居與火祆教」『敦煌學史事新證』蘭州, 甘肅教育出版社, pp. 73-97.

陳連慶

1987 「漢唐之際的西域賈胡」敦煌文物研究所(編)『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文史·遺書編)』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 上冊, pp. 78-108.

叢振

2012 「西域『鴉子』與唐代社會生活」『新疆師範大學學報』6, pp. 45-51.

de la Vaissière, É.

2002 *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 Paris: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Collège de France.

馮培紅

2009 「敦煌大族與前涼王國」『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XXIV, pp.93-129.

後藤勝

1967 「河西王国の性格について」『歴史教育』15-9/10, pp.29-35.

Grenet, F. & Sims-Williams, N.

1987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In: *Transition Periods in Iranian History*, Leuven, pp. 101-122.

Grenet, F. & Sims-Williams, N. & de la Vaissière, É.

1998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V.” In: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XII, pp. 91-104.

Henning, W. B.

1948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XII-3/4, pp. 601-615.

侯燦 & 楊代欣

1999 『樓蘭漢文簡紙文書集成』成都，天地出版社。

胡平生

1991 「樓蘭出土文書釋叢」『文物』8, pp. 41-47, 61.

寇克紅

2008 「建康史氏攷畧」『社科縱橫』10, pp.117-119, 124.

百濟康義 & ヴェルナー・ズンダーマン & 吉田豊

1997 『イラン語斷片集成：大谷探検隊収集・龍谷大學所蔵中央アジア出土イラン語資料一解説編一』京都，龍谷大學。

雷聞

2004 「割耳髡面與刺心剖腹——粟特對唐代社會風俗的影響」榮新江 & 張志清（主編）『從撒馬爾干到長安——粟特人在中國的文化遺跡』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pp. 41-48.

陸慶夫

1992 「畧述五涼的民族分佈及其融合途徑」『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 pp.47-53.

羅丰

2000 「北周李賢墓出土的中亞風格鍍金銀餅——以巴克特里亞金屬製品為中心」『考古學報』3, pp. 311-330.

秦烈新

1972 「前涼金錯泥箭」『文物』6, pp. 36-37.

饒宗頤

1982 「穆護歌攷——兼論火祆教入華之早期史料及其對文學・音樂・繪畫之影響」『選堂集林 史林』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pp. 472-509.

榮新江

2005 「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補攷」『西域研究』2, pp.1-11.

2007 「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落補攷」『歐亞學刊』6, 北京，中華書局，pp. 165-178.

2014 『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Schafer, E. H.

1963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ims-Williams, N.

2001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II." In: *Philologica et Linguistica: Historia*,

Pluralitas, Universitas: Festschrift für Helmut Humbach zum 80. Geburtstag am 4. Dezember 2001 (Herausgegeben von Maria Gabriela Schmidt und Walter Bisang unter Mitarbeit von Marion Grein und Bernhard Hiegl), Wissenschaftlicher Verlag Trier, pp. 267-280.

園田俊介

2007 「河西画像磚墓にみえる胡人図像—魏晉期の酒泉を中心として—」『西北出土文献研究』5, pp. 101-119.

Trombert, É. & Ikeda On & Zhang Guangda

2000 *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 Fonds Pelliot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Paris: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du Collège de France.

王其英 (主編)

2001 『武威金石錄』蘭州, 蘭州大學出版社.

王素

1985 「魏晉南朝火祆教鉤沈」『中華文史論叢』2, pp. 225-233.

Whitfield, S. & Sims-Williams, U. (ed.)

2004 *The Silk Road: Trade, Travel, War and Faith*,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吳玉貴

1997 「涼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唐研究』3,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pp. 295-338.

辛姆斯·威廉姆斯

2005 「粟特文古信劄新刊本的進展」(Emma WU 譯)『法國漢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粟特人在中國——歷史·攷古·語言的新探索』北京, 中華書局, pp. 72-87.

徐光冀 (主編)

2012 『中國出土壁畫全集』9「甘肅 寧夏 新疆」北京, 科學出版社.

姚薇元

1962 『北朝胡姓攷 (修訂本)』北京, 中華書局.

Yoshida Yutaka

1994 “Additional Notes on Sims-Williams’ Article on the Sogdian Merchants in China and India.” In: *Cina e Iran da Alessandro Magno alla Dinastia Tang* (a cura di Alfredo Cadonna e Lionelle Lanciotti), Firenze: Leo S. Olschki Editore, Mcmxcvi, pp. 69-78.

周紹良 (主編)

1992 『唐代墓誌彙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朱雷

2000 「東晉十六國時期姑臧·長安·襄陽的『互市』」『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pp. 327-336.

〔補記〕本文為蘭州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絲綢之路商業民族——粟特人在甘肅的基礎數據調查與研究”（15LZUJBWZX011）的階段性成果。感謝大阪大學白玉冬·赤木崇敏·山本孝子博士在資料上提供的幫助！初稿原題「粟特人與五涼王國」，曾於2014年12月28日在蘭大中國古代史研討班上宣讀討論，得到本所同事的批評教示；因篇幅過長，遂截取其中前涼部分並作壓縮修訂，並於翌年1月22日在張掖舉行的西北出土文獻與中古歷史研讀班上交流討論，得到諸班員·河西學院諸先生·張掖市圖書館黃岳年館長的批判指正，在此一併深致謝忱！